



文化

中国与世界

CULTURE: CHINA AND THE WORLD

1

G⁰/2

68912

文化：中国与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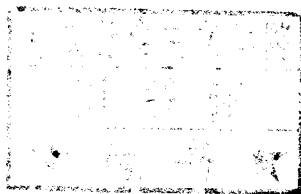
(第一辑)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编



200177637

2250/01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封面设计：宁成春

文化：中国与世界(一)

WENHUA ZHONGGOU YU SHIJIE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印张 208,000字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0,000

书号 7002-96 定价 2.10元

《文化：中国与世界》

编 委 会

顾 问：杨周翰

李泽厚

庞 朴

主 编：甘 阳

副主编：苏国勋

编 委：于 晓 王 炜

王 焱 王庆节

甘 阳 刘 东

刘小枫 孙依依

纪 宏 余 量

何光沪 苏国勋

陈 来 陈平原

陈维纲 陈嘉映

林 岗 周国平

胡 平 赵越胜

徐友渔 郭宏安

阎步克 秦晓鹰

(以姓氏笔划为序)

开 卷 语

中国要走向世界，理所当然地要使中国的文化也走向世界；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理所当然地必须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这是八十年代每一有识之士的共同信念，这是当代中国伟大历史腾飞的逻辑必然。

《文化：中国与世界》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中诞生的。她以“文化”作为战略研究对象，力图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过去、现在、未来进行全面的、持久的、深入的总体性研究和系统性比较，以此为建设当代中国文化作坚实的理论准备和艰苦的实践探索。

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和形成必须具备三个最基本的要素或环节：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二、继承中国文化传统、光大中国文化传统；三、吸取世界文化成果、把握世界文化趋势——《文化：中国与世界》以此三点作为她的基本方针和奋斗目标。

为富有想象力地创造出当代中国文化的崭新形态，为满怀自信心地眺望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融会合的远景，我们愿意竭尽绵薄，与大家共同努力。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

一九八六年一月于北京

02-50-61

目 录

开卷语

中 国 文 化 研 究

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

问题……………甘 阳 (2)

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

现代意义 ……………余英时 (38)

——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总论

自在者说(组诗十六首)……………杨 炼 (92)

析杨炼的《自在者说》……………宇 峰 (117)

比 较 研 究

恬然于不居所成 ……………熊 伟 (133)

——在北美海德格尔学会第十六届年会上的发言

为旋风命名：曹雪芹与

海德格尔……………〔美〕L. 米 勒 (139)

外国文化研究

马克思·韦伯与“资本主义

精神” 苏国勋 (161)

“上帝死了!” 周国平 (210)

——论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

日本现代化与日本哲学 卞崇道 (231)

文化学基本理论

深描说：迈向解释的文化理论

..... [美] 克利福德·吉尔兹 (261)

本辑文章英文提要 (299)

中国文化研究

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

甘 阳

【内容提要】 八十年代中国兴起的文化讨论，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提出来的历史任务，因此，着眼于中国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的现实关系问题，当是今日讨论中国文化的基本出发点。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根本任务，是要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文章回顾了近百年来“中西古今文化之争”，强调文化讨论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中、西文化的差异有多大，而是在于中国文化必须挣脱旧的形态而走向“现代文化形态”。因此，“文化的冲突”（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当前文化争论的核心理论问题之一是“传统”问题。传统并不等于“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而是永远向“未来”敞开着无穷的“可能世界”；弘扬光大传统的最强劲手段恰恰是“反传统”。

作者**甘阳**，杭州人，一九五二年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人员。已发表的文章有：《八十年代中国文化讨论五题》（《瞭望》周刊海外版）等；并有译著：卡西尔《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版）。

百年大课题

一九八五年以来，所谓的“文化”问题已经明显地一跃而成为当代中国的“显学”。从目前的阵阵“中国文化热”和“中西比较风”来看，有理由推测：八十年代中后期，一场关于中国文化的大讨论很可能会蓬勃兴起。

这场“文化讨论”绝不是脱离中国现代化这一历史进程所发的抽象议论，而恰恰是中国现代化事业本身所提出来的一个巨大历史课题或任务。它实际上相当深刻地说明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分析以及对中国未来文化的筹划，实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事实上，只要稍稍回顾一下就会承认，仅仅几年以前，文化或中国文化的性质这类问题还只是三两“好学深思之士，心自知之”的事，因此尽管有些论著也曾一时倾动学林，但在并没有也不可能出现热烈的文化问题讨论。这是因为这个问题只是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展才逐渐明确或突出出来的——“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马克思）——粗略说来，自十年动乱结束，现代化的任务被重新提出以来，中国人走了三步才走到文化这个问题上来：首先是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随后是加强民主与法制并进行大踏步的经济体制改革，因为没有相应的先进管理制度，先进技术有等于无；最后，文化问题才提到了整个社会面前，因为政治制度的完善、经济体制的改革，都直接触及到了整个社会的一般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文化心理与文化机制。我以为，这就是

今日“中国文化热”和“中西比较风”的真正背景和含义。也因此，着眼于中国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的现实关系问题，当是我们今日讨论中国文化的基本出发点。

百余年来，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始终或隐或显、或明或暗地进行着；中学西学之争、旧学新学之争、学校科举之争、文言白话之争、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之争……，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曲折艰难。从一定的意义上讲，今日之种种情况在上世纪的中国已经颇为相似地走过一遭了。前面所说的今日走向文化问题的三步，实际上也恰是上世纪的中国人走了半世纪之久的路程。当年维新变法时期的顽固派曾廉的一句话，颇值得在此一引：“变夷之议，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1〕这里所说的“技”，就是今日所谓先进技术的“技”。曾廉所指的“言技”，则是指当时的“船坚炮利”之议——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的“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李鸿章）——这是上世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事；这里所说的“政”，就是政治的“政”，曾廉指的是可以《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等为代表的变法派当时已“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育才于学校，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用心……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2〕——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事；这里所说的“教”，就是教化之“教”，就是文化传统、文化心理、文化素质、文化机制，曾廉指的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全力摧毁、踏平几千年来中国儒教文化传统的“叛逆”。初看起来，康有为部《新学伪经考》，不过“辩数十篇之伪书，则何关轻重”？梁启超答得明白：“殊不知此伪书者，千余年来，举国学子人人习之，七八岁便都

上口，心目中恒视为神圣不可侵犯，……若对于经文之一字一句稍涉拟议，便自觉陷于非圣无法，蹙然不自安于其良心，非特畏法网惮清议而已。……而〔康有为〕研究之结果，乃知畴昔所共奉为神圣者，其中一部分实粪土也，则人心之受刺激起惊愕而生变化，宜何如者。”〔3〕——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事。

从四五十年代起的“言技”，到七八十年代的“言政”，再到九十年代的“言教”——这就是上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路。值得庆幸的是，今日之情况虽然与上世纪“言技、言政、言教”的路程显示出某种重复之处，但毕竟已是完全不同的了。这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回复。上世纪只是少数人在强大的封建统治重重阻力下所发出的微弱的资产阶级改良要求，而今日则是举国上下同心同德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的强大历史洪流。上世纪经半世纪之久才走到“言教”，而今日不过五、六年即走到了文化问题上，就已雄辩地说明了这种时代的不同。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看到，今日之事在某种程度上仍是在补旧日之课，中国现代化的曲折艰难也就在这里。尤可注意的是，“言技”甚至“言政”，虽然也常常一时横遭非议并历经反复，但至少就“言”而论或就理论上来说，大致还是比较容易推开、比较能为人接受的。唯独言一及“教”，在中国就非同小可了。正如张之洞当年所言，中国人之接受科学技术，只有在守住孔孟之道的基础上才可被允许（“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张之洞：《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然而一旦有人要反对中国传统的伦理教化，则真是“怵心骇耳，无过于斯”〔4〕。正因为如此，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陈独秀率先发表了《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总结上世紀以来言技、言政、言教的过程说：“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

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按即指“科技”〕，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在陈独秀看来，在伦理教化这个根本问题上，中国人如果“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惛恍迷离之境”〔5〕。陈独秀不愧为五四知识分子的一代领袖！因为中国传统的“教”亦即传统的文化心理、文化素质、文化机制、文化背景，实是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势力的最后阵地，最后防线，中国走向现代世界的进程必然会在这个最后阵地和最后防线上遭到最顽强、最持久、最全面的抵抗，换言之，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之间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冲突！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种历史冲突中必然处在首当其冲的位置上，因为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对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要求最为敏感、最为向往，但另一方面他们恰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嫡系传人，历史的冲突在他们身上也就常常表现为自我冲突。因此，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东、西方文化大碰撞下的反应，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格化表现，而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成熟度，也就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化事业成熟度的精确指示器。我们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今日讨论中国文化，不应忘掉龚自珍“不似怀人不似禅，梦回清泪一潸然”的悲愤凄苦，不应忘掉魏源等“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艰难困顿，不应忘掉康有为等“不量绵薄、摧廓伪说”的慷慨激昂，更不应忘掉鲁迅在五四以后依然难以摆脱的巨大徬徨：“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象是长嗥，象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八十年代重开中国文化讨论，无疑是百年以来文化争论在

更高层次上的继续和深入。这种历史的连续性就在于：百年以来中国历史走过的路程，在某种意义上都还只是中国现代化的准备阶段；只有今日，中国的现代化才算真正迈开了它的历史步伐，也因此，百年来中国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遭遇、冲突实际上都还只有前哨战的性质，因为那时的冲突主要是政治冲突，这种冲突最直接、对抗性最强，但相对来说也就是最简单、最容易解决的冲突。今日中国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已不复具有直接的政治冲突的性质，但却具有另一种更为广阔、更为深刻、更为复杂的总体性全方位冲突，我把它称为“文化的冲突”，亦即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说得更具体点，也就是在千百年“尊尊亲亲”的家庭制社会结构基础上所形成的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传统心理、传统知识形态、传统行为方式，与现代化社会必然要求于中国人的现代意识、现代心理、现代知识形态、现代行为方式之间的全方位遭遇和总体性冲突。这样的历史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要进入现代化的行列，都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这种“文化的冲突”，亦即都会面临一个从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系统走向现代文化系统的任务。我个人认为，现代化，归根结底是“文化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只有最终落脚在一种新的现代中国文化形态上，才算有了真正的根基和巩固的基础，否则其他方面的现代化或者将难以达成，或者甚至得而复失。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文化极其深厚的国家，如果不明确地提出“文化现代化”的任务，那就势必会严重阻碍中国现代化的总体历史行程。因此，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正是要富有想象力地去探索、开创中国的现代文化形态。而要完成这个任务，就不能不正视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与中国现代文化形态的区别与冲突。



突。在这里，我们不能不首先弄清楚一个根本问题：百年来的“文化之争”究竟是——

中西之争还是古今之争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问题的大讨论，几乎总是与对西方文化的讨论和评价密不可分地纠缠在一起，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对中国文化的讨论本身就是“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所促成的。千百年来闭关锁国的中华大帝国，在近代以来突然受到了另一种文化的挑战，并在这种外来文化面前几乎溃不成军，这就不能不使中国知识分子在痛定思痛之余，猛回头而敲响了警世钟：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究竟如何？中西文化的差异究竟何在？

但是，正因为对中国文化的检查是在外来文化的刺激、冲击下发生的，正因为对本民族文化的反思总是与对外来文化的态度纠缠在一起，近代以来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就变得异常的复杂、异常的棘手，甚至常常模糊了事情的本质。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就在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地域文化差异常常被无限突出，从而掩盖了中国文化本身必须从传统文化形态走向现代文化形态这一更为实质、更为根本的古今文化差异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在历来的文化讨论中常常出现一种本末倒置的现象：我们的根本目的照理来说本应是检查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有什么样的问题，使得中国人在近代大大落伍，从而寻求解决的办法，尽快把中国传统文化形态改造成崭新的中国现代文化形态；而中西文化的比较本应是服从于这个根本目的的，亦即看看西方文化能否在这方面有所借鉴，特别是应考察西方文化是

如何从其传统形态走向现代形态，从而促进了它们近代的强盛。结果却是手段常常变成了目的，我们总是不知不觉地用抽象的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说穿了多半是儒家文化）与抽象的西方文化（实际上是经过了“知识论转向”以后的近代西方文化）之间的泛泛比较与笼统区别，来回避、模糊、转移甚至取消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与中国现代文化形态的区别这个更为实质的问题（与此同时也就忽视了西方文化本身也有一个其传统形态与现代形态的区别）。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讨论中，海内外的许多论者似乎都比以往更加突出地强调了“中国文化有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中国文化有它自己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根本不同”……，例如，中国文化是内倾的或内在超越的，西方文化是外倾的或外在超越的；中国文化是静的，西洋文化是动的；中国哲学是直觉性的，西洋哲学是逻辑实证的；中国重人文，西方重科技；中国人讲究伦常日用，西方人追求理论构造，等等、等等。这就给人以一种强烈的印象，似乎中国文化（或至少是其基本形态、标准模式、总体结构、核心范畴、价值取向等等）就只能是这样，过去是这样、今日也只能这样、将来也必定还这样；反过来也一样，西方文化一定是那个样子，它历来就是如此，以后也永远如此。而且中国之为中国，西方之为西方，其不同也就在这些个分别上。如若不然，不就抹杀了文化的特殊性、个性或民族性？

应该说，所有这些都不是没有道理，中西文化当然有区别而且有很大的区别，研究并指出这种区别本来是大有裨益的事，但是由于过份强调了中国文化（确切说并不是中国文化，而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优越性？），这样的比较实际上也就有意无意地渲染、助长甚至论证了一种通常很少明言，但却确实实

是根深蒂固的基本观念或基本态度：尽管中国社会要从传统形态（小农经济）跃入现代形态（大工业生产），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态却并不需要进行根本的改造和彻底的重建。我以为，正是由于这种相当普遍的态度或倾向，使得对中国现代文化形态的探讨始终未被提到文化讨论的中心位置上来。我们似乎宁愿把中国人当成爱斯基摩人那样来看待，而又把中国文化当成博物馆中的古董那样来摆弄，检查中国文化成了炫耀祖宗遗产、文化比较则成了证明中国文化独特性的手段，西方文化的存在在这里恰恰倒成了中国文化可以固步不前的根据和理由，因为“中学之外，别为西学”。由此，我们常常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老地方原地不动，问题并没有解决，但却已经被取消了；中国传统文化本身似乎并不存在要改造为现代文化形态的问题，那都是由于中西文化根本不同造成的错觉而已。正因为如此，文化讨论的真正问题和根本任务——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却反而被束之高阁，以至消解于无。例如，几乎谁都明白，中国传统文化之所谓内倾的、静的、重直觉、重人文，只求伦常日用这种性质，正是中国人近代大大落伍在文化上的根本病症，也几乎谁都清楚，西方文化之所谓外倾的、动的、重逻辑、重科技、重理论，无非也就是所谓的“科学理性精神”（并不简单地等于“实证精神”），也就是西方人近代强盛在文化上的基础所在，那么显而易见的，真正的问题就应当是：如此这般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否适应中国人的现代化要求？中国的现代化是否也需要培养起一种以“科学理性精神”为整体特征的现代文化系统？如果需要，又应如何着手？冯友兰先生当年倒曾追究过，中国人究竟是“为之而不能”还是“能之而不为”。但在我看来，问题可以用更为直截了当的方式提出：第一，“有没有”（即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具有作为总体特征